

小品和足球 曾经是同道

“中国足球需要实干家,不需要键盘侠。”近日,某足球明星在微博上怒怼一位知名小品演员,以回应后者对某足球队的批评。

遇到批评,常见的反驳便是:外行有啥资格品头论足?

其实,稍懂历史即知,小品演员谈足球,还真不算外行。在古代,俳优与蹴鞠同属百戏,均归太常寺中的太乐署管理,穿越回去,小品演员和足球运动员算得上“同行+同事”。

我国自东汉起便形成了在重大节日庆典上举行百戏表演的制度,除娱乐、休闲之外,还有其他目的:俳优可以起到劝谏、下情上达的作用,元代学者杨维桢曾称赞说:“一言之微,有回天倒日之力。”至于蹴鞠等技巧类项目,从战国时代就曾被视为“讲武之礼”,是为了“用相夸示”,隋炀帝曾在西域办过几次大型表演,让“胡人大骇”,“竟破吐谷浑,拓地数千里,并遣兵戍之。每岁委输巨亿万计,诸蕃惧惧朝贡相续”,暂时稳定了西北局势。

时代发展,如今百戏细分为杂技、魔术、小品、摔跤、足球等,已是术业有专攻,但内部仍有相通处,即隋文帝斥百戏时提出的“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”——务求实绩,而不是凑热闹、养闲汉。

至少古人是这样看的:只要坚持这一标准的批评,就是内行意见。

汉人“幽默”让人受不了

古代专有“优谏”一词,指俳优在演戏中进行的讽谏。

秦始皇“行自奋之智,不信功臣,不亲士民”,刘邦则鄙夷儒生,



清代 黄慎《蹴鞠图》

“与人言,常大骂,未可以儒生说也”。汉武帝更可怕,他说:“所谓才者,犹有用之器也,有才而不可尽用,与无才同,不杀何施?”

如此氛围,大臣们都被逼成弄臣。仅汉武帝一朝,便有东方朔、严助、吾丘寿王、司马相如、严安、枚皋等。

汉代人善写刻板文章,其“幽默”让人受不了。比如戴良的《失父零丁》,如此描写他爹:

我父躯体与众异,脊背伛偻卷如截(音如字,意为切成的大块肉),唇吻参差不相值,此其庶形何能备。请复重陈其面目,鵠头鹄颈獮(音如歟,即短嘴狗)狗啄,眼泪鼻涕相追逐,吻中含纳无齿牙……

作者假借寻父,挖苦有生理缺陷的人。汉代文人最爱这种哏,蔡邕用《短人赋》挖苦侏儒,王褒用《责须髯奴辞》,称有胡子的奴隶“曾不如犬羊之毛尾,狐狸之毫牦”,几近于骂。环境太压抑,文人们也变得刻毒。

唐廷对俳优限制多

三国时,曹操“每与人谈论,戏弄言诵,尽无所隐,及欢娱大笑,至以头没杯案中”,他的儿子曹丕、曹植都喜欢开玩笑,俳优再度受重视。

隋文帝曾废百戏,但隋炀帝又集天下艺人三万余人于东都洛阳,设教坊,唐代因之。据《新唐书》,唐初太常寺散乐人计382人,仗内散乐人1000人,音声人10027人。唐玄宗时规模进一步扩大。

曾经是同道

被下狱问罪。两名俳优扮书生见面,互问年庚,一人称“甲子生”,一人称“丙子生”,有俳优说:“都该下狱问罪。”宋高宗问为什么,回答说:“饺子(甲子)、饼子(饼子)都生,和馄饨生同罪。”宋高宗大笑,赦免了厨师。

明朝俳优有骨气

明初舆论环境恶劣,据焦循《剧说》引《国初事迹》:朱元璋让乐人张良才说平话,张良才布置舞台,擅写“省委教坊司”招子,贴在门柱上。朱元璋知道后,大怒:“贱人小辈,不宜宠用。”让人将他捆起来,扔到水中。

明代理学家鄙夷俳优,认为他们“染神丧志”“非徒无益”。但明代俳优颇有民族气节,在大是大非上绝不退让。

明清之际,许多明臣投靠新主子,包括著名诗人、“江左三大家”之一的吴伟业。在宴会上,他特意点《朱买臣休妻》,因座中有人姓张,剧中角色名“张石匠”,欲以调笑。可俳优每唱到“张石匠”,都改成“李石匠”。就在吴伟业称赞俳优聪明时,俳优突然把台词改成:“姓朱的有甚亏负你?”

剧中主角姓朱,明朝皇帝也姓朱,此处是一语双关,吴伟业大惊,避席而去。

连慈禧太后都敢挖苦

清朝也不乏耿直的俳优。

学者李颖在《明清俳优戏的语言艺术》中钩沉,光绪时一次堂会,天热,座中皆武将,着装严谨,奴仆却多赤膊。一俳优指台下问丑角刘赶三:“此何炎炎,而彼何凉凉者?”刘赶三说:“各位老爷都是吃过冰的。”“吃冰”指武将贪污军饷。

刘赶三连慈禧太后都敢挖苦。一次去宫中唱《十八扯》,刘赶三扮皇帝。临入座,突然到场口说:“吾为假皇帝,尚能坐,彼真皇帝日日侍立,又何曾得坐耶?”因慈禧看戏时,光绪只能站在一旁。刘赶三当众指出,慈禧只好赐光绪坐。

甲午之战失败后,李鸿章的御赐黄马褂被剥夺,俳优杨鸣玉演《水斗》时,扮龟丞相,对手是鳌形大将军,穿黄马褂,杨现场“砸挂”,加了句台词:“如有退缩,定将黄马褂褫夺不贷。”表达了百姓对清军战败的不满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

汉代俳优俑(说唱俑)